

张澜从“川北圣人”到共和国副主席

机场亲迎毛泽东

1945年8月10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了重庆，73岁的张澜老泪纵横。但兴奋之余也在担忧是否会发生内战，他所期待的政治民主是否能实行。“且漫四强夸胜利，国家前途尚茫茫。”

张澜字表方，大家习惯称他为“表老”。

8月28日15时半，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毛主席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银鬃飘飘的张澜，不等介绍就走过去了：“你是张表老？你好！大热的天，你还亲自到机场迎接，不敢当啊不敢当！”表老说：“你为国事操劳，不负众望，应当应当！”

因为德高望重，张澜被称为川北圣人，当时流传有“得四川必先得张澜”的说法。当年蒋介石入川，陈立夫屡次动员张澜前去迎接，他没有去。所以毛泽东对前来机场迎接的张澜十分敬重。

与国民党渐行渐远

早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张澜、黄炎培等人就把他们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改造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贯反对结党、已经69岁的张澜被硬推上了主席这个位置。“成立后无法宣布，也没法活动，蒋介石不断让人查办，后来去香港办《光明日报》，准备在那张报纸上宣布这消息，结果国民党又派人去香港阻止这个消息公布。”

民盟分为多个党派，各有各的政治立场。范朴斋在1947年的文章《张澜为人怎么样》里说，民盟是个相当复杂的团体，也因此有人以为张澜先生手段高明，其实他的高明之处就是直，巧妙之处就是拙。原

民盟副主席罗涵先说，当时民盟论才华要算罗隆基，论与共产党的接近，要算沈钧儒和史良，张澜以道德文章取胜。

在1942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张澜他们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议案激怒了蒋介石，他在会上就大骂：“把我当宣统了。”

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民主同盟，凡是愿意参加的个人都可加入。张澜亲自出马，发动四川和云南的国民党要员龙云、刘文辉、潘文化等成为民盟秘密会员，5年后，当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关头，他们的起义减少了各方面的损失。

1946年1月，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当时国、共、民盟各有8个名额，周恩来为了让民盟便于分配，让给了民盟一个名额，张澜深受感动。可是不久内战全面爆发，张澜极其失望，发表了不参加国民党自行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的声明。

11月12日，伪国大召开的时候报纸上没有民盟的名字，这也表示民盟和国民党的彻底决裂。

民盟解散与生死之险

1947年10月28日，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是非法团体，盟员按照《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处理。10月29日，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真相》。11月5日，张澜等人在上海对陈立夫起草的一个字不许改的解散文告，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康大寿说，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是你们自行宣布解散，就不执行异党分子处理办法，“也就是不逮捕你们的成员”。

黄炎培含泪读了文件，张澜签了字。他当晚对民盟的宣传部长叶笃义说：“杀头我不怕，我担心的是大家的安危。”

在他的安排下，沈钧儒等人去香港着手恢复民盟，而张澜在住所被特务严密包围的情况下筹措经费，所筹集的巨额款项一分不留，全部用做民盟的经费。当时他已经身患重病。

当时上海虹桥疗养院的丁惠康因为仰慕他的为人，坚决请张澜和罗隆基去疗养。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的亲信张群来求他在国共双方之间做调解，可是表老明确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站在共产党这一边，不再做调解人了。因为这次拒绝，蒋介石决意要置张澜于死地。

1949年3月5日，民主同盟总部迁至北平，3月6日致函张澜：“本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已于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命驾来平，参加领导。”接着，进驻北平的毛泽东又邀张澜等赴京参会。

上海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害怕张澜、罗隆基逃脱，5月10日下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副队长阎锦文前往疗养院抓捕。“疗养院的郑定竹副院长说，不能带走，因为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走了就会死，而且他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澜不会逃走。”经请示后，改为拘留院内，把张澜、罗隆基住的地方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班警戒。

5月26日下午，毛森命令阎锦文晚21时以前将张澜、罗隆基押解到黄浦江上的一艘轮船上，这是国民党撤离上海去台湾的最后一艘船。阎锦文来到张澜房间吼叫着要带人走时，张澜坚决表示宁死也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枪毙吧！阎锦文只得告诉罗隆基他是受杨虎委托来救他们的。罗隆基问道：“有什么凭据让我相信你

是杨先生派来救我们的？”阎锦文拿不出证据，急得手足无措。双方正不知如何是好，罗隆基忽然想起杨虎的太太，便立即与其通话，得到确认后才放心。

毛森立即组织人马四处搜捕，并悬赏30根金条抓获张澜和罗隆基。黄浦江上的轮船推迟到当夜零点之后才起锚开往台湾。

时为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有意投向新政权，希望戴罪立功。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通过地下党转告杨虎，要他设法营救张澜等人，而负责看守的阎锦文又正好是他亲信，于是才有了上述奇迹般的营救行动。

共和国副主席家的菜园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想做官的张澜被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当时来自解放区的一些同志看表老戴瓜皮帽，穿长衫，一副遗老的样子，表示反对。结果朱德公开讲话了，“讲到革命，诸位没有一个有他早的。”从辛亥革命之前的“保路风潮”，到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表老在川北组织自治，再到冒着杀头的危险组织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彻底地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大家哑口无言”。

周恩来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张澜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说：“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

1955年，张澜病逝于北京。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周恩来生前遗愿：死后四把骨灰分别撒在何处？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其中周恩来的去世、他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是最为揪扯中华民族人心的大事之一。

遗愿骨灰不保留 泪飞顿作倾盆雨

周恩来辞世的当天，邓颖超即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三天后，邓颖超把当时的西花厅党支部书记、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和支部委员、周恩来生前贴身卫士高振普叫到她的办公室，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党中央已经批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的逝世，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张树迎、高振普等人的悲痛自然更不用说了。邓颖超继续说：“你们是跟随恩来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后一个请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也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邓颖超说不下去了，张树迎、高振普两人的泪水已夺眶而出。邓颖超强抑住悲痛，安慰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来骨灰的消息后，我很高兴。我高兴的是，恩来生前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终于可以办成了，他的遗愿就要成为现实了。我们要共同为实现他的这一遗愿而继续工作。我也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条件已不允许我去做了。因为天气太冷了，我年岁又大了，一出去‘目标’就大。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人，你们二人都是恩来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员，所以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做这件事……”

邓颖超的一番话，既道出了周恩来的遗愿以及他为实现这个遗愿所作的安排，同时也是对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莫大信任。于是，张树迎、高振普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三个人先后到北京的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察看。1月的北京，天寒地冻，没有选择到一个合适地点。因为大

家都知道，全国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情感，他的骨灰如果撒到地上、冰上，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搜集一点留作纪念。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由罗青长、郭玉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高振普4个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

1月15日下午，周恩来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领着张树迎等西花厅工作人员，以及罗青长、郭玉峰等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的骨灰静静地放在那里，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他们跟在邓颖超身后，立正、低首、默哀。

默哀完毕后，邓颖超超前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骨灰，两眼含着泪水，十分坚强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在场的人立即发出一片哭声。

1月15日晚上7点半左右，张树迎从邓颖超手中接过了骨灰盒。为避开群众，他们通过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坐上当年斯大林赠送给周恩来的苏制灰色吉姆车。邓颖超由她的秘书及保健人员等陪同，乘坐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离开人民大会堂，利用夜色的掩护向东驶去。晚8时许，他们一行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原用于撒农药的苏制安-2型小飞机停放在那里。

头把骨灰撒北京 热爱首都一片情

飞机平稳起飞后，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1918年夏天，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度假，在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共享天伦之乐。那时北京给他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一年之后，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数次在京、津之间往返，与他的战友马骏、张若茗等一起到北京总统府前请愿，留下了他们“大闹天安门”的足迹。

建国后，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

长达27年，与首都人民朝夕相处，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党、各派、各界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无数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包括开国大典在内的大型重要集会。他曾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团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连新华门前那对无名的石狮子能“活”到今天，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与智慧！他在重病期间，还乘上施工用的电吊车登上北京饭店的顶部，实地观察北京饭店究竟建多高才适宜。在首都，他还亲自参与处理了建国初的“高饶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会见了许多中外元首和政府首脑如金日成、胡志明、尼克松、田中角荣等，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留有他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呼号的余音，那是他留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他关切着北京市民的用水，关注着北京街头的整洁，也关心着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如此等等，使他与首都人民有着血肉深情的联系。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让他和首都人民永远在一起。

二把骨灰撒密云 难忘治水为人民

周恩来的第二把骨灰是撒在密云水库上空的。

到过北京周恩来西花厅办公室或者在淮安参观过仿建的西花厅的人都知道，在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置有两架小飞机模型。据原西花厅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两弹一星’及航天飞行等），一个水利。”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给市区的地表水只有城西郊的玉泉山一地，年平均供水量在3000万立方米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更跟不上工农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为了抓好北京水利资源的开发，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他先后主持有关方面修建了

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并亲自率领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安排下，20多万建设大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可蓄水43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从当时我国的国力、技术等条件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三把骨灰撒天津 津门起步闹革命

周恩来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1913年春，因四伯父周贻庠从沈阳调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也随四伯父来到天津，并于那年暑假考入仿欧美风格办学的私立南开学校。从此，他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还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坐牢达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在天津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亲密战友，特别是结识了他后来的伴侣邓颖超。

四把骨灰撒滨州 亲山水报母亲

周恩来的最后一把骨灰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周恩来生前曾无数次表达过他对母亲的怀念。无论是在天津坐牢期间写下的《念娘文》（该文现已失传），还是留学日本时记下的念娘日记，无不充满对他抚育他成长的母亲的感激之情。

周恩来12岁离家，从读书追求革命真理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未能再回故乡一趟。“母亲坟前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他期望死后将骨灰撒进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的母亲。同时，祖国也是我们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母亲，他回归了母亲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

摘自《党史博览》